

丛书编者前言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的出版动议起于2005年，它精选自中国大陆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系列教材。2005年年初，由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王政教授牵线，复旦大学与密西根大学高层领导面晤商谈两校全面合作协议。王政教授提出的设立两校合作的社会性别研究所和开办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的动议得到了两校高层的共同认可。该项目争取到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于2006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这一中国大陆首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包括七门核心课程，共计21个学分：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社会性别与历史、社会性别与社会、社会性别与文化、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跨国女权主义。这七门课程全部由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主讲，由国内青年学者担任助理教授。这七门课程和任课教授分别是：

“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卡罗·波德(Carol Boyd)，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所长、护理学院教授；

“女权主义理论”，塞东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密西根大学的学院荣誉教授(Martha Guernsey Colby Collegiate Professor)、英文系系主任；

“社会性别与社会”，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纽约大学教授；

“社会性别与历史”，王政，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

“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学院荣誉教授；

“社会性别与文化”，派茨·雅格(Patricia Yaeger)，密西根大学英文系学院荣誉教授(Henry Simmons Frieze Colleg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Women's Studies)和薇乐芮·查博(Valerie Traub)，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教授、妇女学系系主任；

“跨国女权主义”，伊丽莎白·温戈茹伍(Elizabeth Wingrove)，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近十年来，众多国内高校教师热情地推动发展、建设全新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所大学(占高校总数的十分之一)开设了妇女学课程。但迄今为止，这些繁荣和发展并未得到主流学界的充分认可与尊重，妇女学者执着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努力仍在学界与高等教育界的边缘徘徊；而学界对妇女学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随处可见。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要想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学科化、体制化迫在眉睫。

从妇女学在美国高校的发展历史来看，妇女学在高校学科化，建立自己的系、所，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对于妇女和社会性别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美国有692所大学设有本科专业的妇女学系或中心，有51所大学可授予妇女学的硕士学位，15所大学在培养妇女学的博士。作为美国妇女学教育重镇的密西根大学，它所采取的相关系科与妇女学系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模式，因为易于向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和传统学科渗透融合，也显得更有活力。

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妇女/社会性别学经过近30年的发展，类似“妇女研究中心”的机构在各地高校随处可见，但绝大多数以课题研究和妇女维权为主要工作，并不直接参与妇女学教学实践和高校课程内容改革。虽然大量的与妇女相关的课程在本科与研究生层面开设，但受制于教育体制与传统学科设置，课程难以全面规划，教授没有交叉合作，在各校零星开设妇女学课程的教授往往缺乏体制支持。除中华女子学院这

样的女子院校之外，成立“妇女学系”几乎成了中国妇女学者遥远的“理想国”。“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学术”引以为豪的创新性、挑战力也因此大打折扣^①。

与学科的体制建设举步维艰同时并存，束缚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相关师资力量的稀缺，难以满足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对这一新兴知识领域的渴求。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框架的各类学术研究尚未进入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主流，即使在冠名为“妇女学”“女性学”的课程中也并非都具有清晰的女权主义学术理论和立场。“打着妇女/性别学的旗帜，在高校课堂照搬各种旧的等级架构或继续制作女性气质、延续性别不平等的课程、写作还很有市场；即使那些想用新的理论、方法来进行变革的学者，也处于革故布新的‘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痛苦中。”^②要巩固与发展这一新生的学术领域，迅速地在高层次培训一批青年学者变得至为重要。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发展需要一批有扎实学术基础和全球视野的学者，来担当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对中国知识构成的转变中的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正希望能够在这一层面有所助推。

作为一次中美合作办学的实践，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全部主讲教授均来自美国高校，所选用的阅读材料多由英文撰写，多数课程的授课语言也是英文——这使学员们能够有机会接触英语世界的最新学术前沿，但是“翻译”也就成了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正如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所强调的，我们同样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考量东西方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成的可能性，就这种“跨语际实践”对教学过程的深刻影响抱有足够的警惕^③。中国当代妇女学科的建设、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的传播在

^① 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少数院校经过多年努力，在社会学系下面设立了妇女学的硕士点，但至今未有任何一级或二级学科下设有妇女学的博士点。

^② 杜芳琴：《妇女学在中国高校：研究、课程和机制》，《社会性别》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得益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妇女学理论及教学本土化的反思方兴未艾,这个博士课程班的开办也正是希望在博士生培养层面真正践行本土化的实践——显然这一挑战是巨大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高校掀起了编辑、出版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教材的高潮,这批教材对于推进高校的妇女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批教材主要针对本科教学,多停留在对基本理论的介绍与普及阶段,对于国际学界近年来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颇为欠缺。而教材的编定与出版,对于在高校确定女权主义话语的合法性尤为重要。教材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更将影响到妇女学在高校的地位与发展前景。

复旦大学—密西根大学博士课程班所使用的教材、阅读材料绝大多数来自英文语境,教材与阅读材料的编排、翻译耗费了项目组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我们对于以英语世界(不仅是西方)最新学术成果为核心教学内容的坚持,基本得到了学员的认同。我们的这种坚持首先得益于授课的美方教授对英语世界最新学术成果的熟稔,而她们深入浅出的解读更是中国学员获益的主要源泉之一。

这种坚持还基于我们对当下国内妇女学科建设的反思,面对英语学界理论与研究成果绝对的强势,光靠摇晃“本土化”的大旗常显底气不足;而对于国际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各相关学科、具体的学术成果的了解、分析、吸收和批判却远嫌不够。社会性别学术在全球各地区发展迅速,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中,博士课程班七门课的任课教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全球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地方化的问题,并自觉地将这些话题引入课程阅读与课堂讨论,介绍了不少研究世界各地社会性别议题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

近代以来,“翻译”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问题。中国女权主义学者若欲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开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翻译”显然是一个虽然痛苦却不可逾越的相伴过程。因此,我们丛书中就有专书讨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而我们的这个博士课程项目更是一次

艰难的“跨语际实践”，在这里翻译不再是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而是来自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以及社会实践的探讨、争辩和反思。它对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理论，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学科的“本土化”，意义深远而重大。

我们清醒地看到：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培养中国自己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术力量任重而道远，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下，也正是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进入中国教育主流的契机。在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变的时代，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等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翻译与出版能使博士课程班在传统大学内部培育女权主义学术阵营的努力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

七门课程中有两门未能纳入这套丛书。因出版计划的变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双语教材已经在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孙中欣、张莉莉主编），而《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由艾晓明教授主编，2006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教材是密西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学研究生课程班（2002—2004年）上的阅读材料，这两门课程亦由密西根大学教授主讲。为免重复和浪费宝贵的翻译人力与出版资源，第一批收入这套丛书的读本共计五本：《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王政、高彦颐主编）、《男性研究》（王政、张颖主编）、《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冯芃芃、郑岩芳主编）、《社会性别与文化读本》（卢丽安主编）和《跨国女权主义研究读本》（李旭、郑岩芳主编）。

这套丛书能够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最需要感谢的当然是王政教授，如果没有她在中美间穿梭奔波、运筹帷幄，就绝对不会有我们这个博士课程项目，也绝对不会有这套丛书的出版。我在这里还一定要感谢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使我们在丛书文章的版权购买、翻译费与出版经费上得以后顾之忧。路斯基金会葛海伦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何进先生和孙巍女士对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工作所给予的理解、信任与帮助，点滴在心。《社会性别与社会》和《男性研究》两书

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后,后续几本却因种种原因拖宕至今,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史立丽编辑,伸出援手,解我困苦。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不才,忝居丛书主编,在此更要对参与这套丛书的选材、翻译、编撰、版权等工作的众多中美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正如王政教授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一书的序言里说到的: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只有更多学者的共同参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才可能在中国有长足的发展”。同样,作为一项参与式行动,我们诚恳地期待着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意见反馈。

陈 雁

2016 年 2 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